

社会学想象中的学校困境

——全国教育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第十三届年会综述

■周元宽 程天君

作者简介:周元宽,男,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安徽芜湖 241000);程天君,男,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社会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江苏南京 210097)。

当下学校存在或面临着哪些以及怎样的困境?又如何来观察和思考处于困境中的学校或这样那样的学校困境?这是每一个教育研究者都会面对和需要正视的问题。教育社会学人近年来便将目光聚焦于此,进行了集体关注和集中研讨。2014年9月19-20日在东北师范大学举行的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教育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第十三届学术年会,来自海峡两岸的教育社会学界近70位专家、学者,围绕“教育社会学的想象力”和“困境中的学校”两大主题进行了研讨。

一、理论聚焦:教育社会学的想象力

半个世纪前,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提出了“社会学的想象力”这一如今看来极富生命力的理论概念和学术思想,主张致力于真正的社会学乃至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都应拥有这种心智品质。作为社会学分支学科以及教育学基础理论学科的教育社会学研究者,是否需要获得这种心智品质,如何培养这种心智品质,以及拥有什么样的教育社会学想象力,与会专家学者们进行了热烈讨论。

有学者从言文分离这一中国人日常生活中极为普遍的现象出发,分析社会学质性研究方法中的深度

访谈,讨论了教育中的权力-知识问题。认为深度访谈只是为了深入了解言文一致的地方世界(西方世界)而开发出来的一种调查技术或治学工具,对于其成为带有世界普遍意义的追求真理的代名词的跃迁过程中所涉及的权力-知识问题,应该保持更深刻的知识社会学反思。在最为显性的层面上,源自音声中心的西方世界的深度访谈试图在言文分离且表意优先的汉语世界里扎根现象本身所内蕴的“文化霸权”、“音声帝国主义”等问题,无论是基于(教育)社会学本土化自觉还是对于(教育)社会学研究本土性追求,都应该拥有足够的批判意识,保持清醒的教育社会学的想象力。

有研究者以涂尔干的古典教育社会学和麦克拉伦的教育社会学实践为个例反思教育社会学,主张教育社会学的学科自觉,不应仅从理论角度展开,还应关注其中的情感动力。无论是作为欧洲古典社会学大家的涂尔干,还是作为北美新一代批判教育社会学代表的麦克拉伦,都可窥见驱动和维系其教育社会学研究实践的情感力量,前者是一种古典主义者特有的忧伤情感在起支撑作用,后者则受着对于“资本主义”及“帝国主义”体制的强烈愤怒所驱使。对于教育社会学来说,无论想象力或理论工具如何重要,也离不开情感力量的支撑或驱动作用。倘若新一代特别是当代中

国教育社会学者既不忧伤也不愤怒,即便并不意味着教育学的终结,至少难免成为一种空洞的缺乏人情味与社会关切的理论(文字)游戏。

有学人基于当下中国教育学研究流弊引发教育想象学之变异的思考。指出“失明症”的想象式研究、“失聪症”的单干式研究、“失语症”的帮腔式研究等三种典型流弊,根源于教育研究中存在的理论中心、概念中心、学科中心、方法中心、西方话语中心等几种极端化或事实上意识形态化的“主义”研究倾向,具体表现为过度的想象力——无本之木式的、脱离实际的无要式想象,褊狭的想象力——坐井观天式的、自我封闭的无他式想象,异化的想象力——移花接木式、食洋不化的无语式想象。鉴于赖特·米尔斯、安东尼·吉登斯、皮埃尔·布迪厄等大家之“社会学的想象力”的思想揭示、理论诠释、实践例示,必须培养研究者历史的感受力、人类学的感受力和批判的感受力,消除教育研究之流弊。

有博士生从米尔斯对美国社会阶层结构分析这一前提以及捍卫美国社会自由和理性价值的最终目标出发,基于《社会学的想像力》的独特背景和分析视角,认为要将“社会学的想象力”迁移到当代中国教育社会学研究中来,应对其思考路径和社会学研究基本视角进行改造性继承以及主题、价值取向和研究方法上的有机结合。与此相关,一些学者分别通过新型乡土知识分子的身份冲突与文化适应、农村留守儿童的学业成长、边陲学校、陈元晖先生学术生活史以及教育实践话语的修辞等主题研究,展示了教育社会学的想象力。

在现场点评与互动中,有学者关于“教育社会学与社会学的想象力有何区别,社会学的想象力与人类一般的想象力有何区别,与其他学科又有何区别”的提问激起了台上台下的热烈讨论和会中会后的诸多思考。

二、实践透视:困境中的学校

聚焦教育社会学的想象力,并非仅仅出于为理论而理论、为思想而思想的理论旨趣,还有着关注教育事实、关切教育社会的实践旨趣。无论是作为教育社会学学者的个人品质,还是作为教育社会学研究的学术工具,教育社会学想象力最终都要在直面教育社会的

研究实践中展演其具体的社会性和现实的生命力。与会学者们运用教育社会学想象力透视困境中的学校,基于不同视角或运用不同方法揭示了不同层面、不同类型的学校困境。

有学者认为,教育改革的困难与不尽如人意,主要不在于缺乏清晰且有说服力的改革蓝图,也不在于缺少懂得如何操作改革过程的教育精英,而在于教育所处的整个社会生态格局的复杂性,其中社会阶层的分化趋势、结构固化、微观政治所形成的阶层生态格局对教育改革的内容、方向、立场与合法性构成了威胁,并形成了以单位保护、家庭投入、总体精英、关系资本等围困教育改革的途径,使得教育改革过程处处充满张力。被围困其中的学校教育如果仅从自身寻求解决之道而试图完成彻底意义上的蜕变几无可能。有研究者则基于一位从教36年村小教师的口述描绘了村校布局调整、村校教师管理、村校教师收入、村校教师退休以及农村教育政策实施过程等方面存在的村校困境,其出路同样需要从城镇化特别是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宏观政策背景和社会变迁进程着眼进行具体考量。另有一些研究者或通过对教育改革活动中的文化冲突现象研究揭示了公众对教育改革活动表现出既促进又阻碍的“变态性支持”,或以某初中为个案的追踪实证研究描述了家长参与学校教育之角色转变的困局,都殊途同归地表明了一个共识性规律,即作为教育问题的“学校困境”,原因不仅在于学校教育自身,更在于作为社会问题的“学校之困境”——学校的社会处境。

有研究者关注高等教育大众化下出现的包括可见的“毕业即失业者”和不可见的“过度教育者”等在内的教育失败者,认为教育失败的深层根源之一在于教育筛选的制度逻辑,即宣称促进向上流动的教育实则已将弱势群体排斥,看似开放、人人可得的教育,实为优势群体垄断了稀缺机会。在“知识改变命运”的幻象和诉求下,教育失败实为现代教育的病症,教育公平也遭受着拷问。与此密切关联的是,有研究者指出当下大学的价值正遭受种种危机,公众心目中种种“读大学无用”观折射出大学价值已呈虚空化态势,大学教育促进社会流动的功能日渐弱化,“划算”和“实用”成为评判大学价值的标准,大学已是失去“灵魂”的教育场所。有台湾学者基于台湾地方的社会现实考察提出了一个“高等教育后问题”,主张政府和社会必

社会学想象中的学校困境

须正视随着社会人口结构变迁而出现的高龄者教育的问题,并从教育经费、教育机构和场所、教育网络平台、课程教材教法等方面予以重视和支持。

有学人基于师范类院校男女生比例失衡问题探讨了教师职业的性别困境。针对教师职业女性化趋势和师范类院校性别分化现象,认为学生对教师职业与院校类型的选择虽有基于个人意志的缘由,但更重要的是社会文化脉络中的结构性因素影响,特别是其背后可能隐含的性别刻板印象和性别化逻辑,因而其变革的理路也需要从社会性别与职业的观念、政策、制度等结构性层面去思考。与此相应的是,有研究者指出当代教师身份建构的困境,即在教师身份的国家制度性规定上,法律法规层面的专业提升与现实层面的专业下降的矛盾对立;在民俗文化对教师的规定性上,教学与管理被寄予厚望但教育行为却被置于大众审视下的现实冲突;在国家与社会发展的规定性上,理想的素质教育与残酷的考试比拼之间的巨大张力。有博士生指出,作为建构高中教师身份之灵魂的教育

信念,在教育实践过程中出现了退化、放逐和割裂三种危机,构成了高中教师教育生存的困境之内因。

与会研究者还围绕教育世界的社会流动、乡村经济、社会分层、教育效率与公平、教师信念、教师发展、教育创新能力、有效学习与有效教学、高等教育机会获得与家庭资本、女性教师的生活世界等话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通过教育社会学想象力的理论聚焦和困境中学校实践透视,与会教育社会学者普遍认为,必须培育教育社会学的想象力,基于教育社会学的学术使命和学科视野,区分“社会环境中的学校困扰”和“社会结构中的教育论题”,通过关注学校教育的处境性困扰而穿透社会——教育的种种结构性论题,进而获得对于当下学校教育之可能存在的种种“问题”的全面认识,并为寻求其解决之道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和理性前提。

责任编辑:程方生